

军事思维

多视角

邓一非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当新军事变革重新描绘战争样貌的时候，陆军对学形成的“思维差”往往比“技术差”更为可怕。——摘自《解放军报》
★军事思维发展变革的轨迹必然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有人类步入信息时代，必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和新态势。——摘自《中国军事科学》2003年第3期
《多视角》是作者对军事思维变革的深入思考，是作者对军事思维变革的深入思考，是作者对军事思维变革的深入思考。

军事思维多视角

邓一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思维多视角/邓一非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65-5733-7
I. 军… II. 邓… III. 军事—中国—文集
IV. E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9411号

书 名:军事思维多视角

作 者:邓一非

责任编辑:刘 莹

封面设计:马立峰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印 刷: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680×960毫米 1/16

字 数:296千字

印 张:19.25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5-5733-7

定 价:32.00元

目 录

第一辑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哲学新视角	(1)
信息时代的军事思维变革	(11)
从新军事变革看政治作战走向主战场	(23)
论解放思想与变革军事思维方式	(33)
深刻把握党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的重大战略思想	(43)
把推进军事训练转变作为训练中政治工作的着力点	(49)
针对多样化军事任务推进政治工作创新	(56)
重视发挥文化软实力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作用	(65)
重视发挥军事训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71)
政治工作要围绕“转变”发挥威力	(78)
军事创新思维漫谈	(87)
军事与科技随笔	(104)

第二辑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113)
强化历史使命教育把握部队建设正确方向	(119)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要防止“六个误区”	(126)
抓好思想政治建设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关系	(132)

把部队理论武装工作引向深入	(137)
加快培养政治工作信息化人才	(143)
紧贴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战争观教育	(150)
拓宽战斗精神培育的战略视野	(157)
试论战斗精神培育的地位作用	(162)
把握我军战斗精神的基本内涵	(169)
深化军事训练改革培育过硬的战斗精神	(176)

第三辑

把院校建设和改革作为迎接时代挑战的着力点	(183)
试论军校教员的职业道德	(193)
抓好院校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对策思考	(197)
搞好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之窥见	(212)
新形势下军校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219)
增强军校文化的育人功能	(225)
发挥先导作用服务改革实践	(230)
注重质量建设造就一代英才	(234)
教育改革与教书育人漫谈	(239)

第四辑

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247)
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事业心责任感	(260)
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	(266)
从过河需要桥和船说起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	(273)
中层领导干部要增强“五个意识”	(287)
后 记	(295)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哲学新视角^{*}

在当今新军事变革强劲发展的势头中，军事理论创新的影响和作用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和直接，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战略调整、加速军队转型的先导工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大力推进我军的军事理论创新，无疑是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必然战略选择。本文谨从哲学层面、以哲学的新视角，思考和探究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路径，以期对把握当今军事理论创新的规律和趋势有所启迪。

认识论视角——必须站在军事变革实践的前沿去把脉军事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路径

理论创新首先是一种认识活动，它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新突破，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新揭示。军事理论创新作为军事认识的结晶，主要是对军事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作的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认识对象——军事及战争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趋势所作的新的揭示和预测，对军事斗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所作的新的理论升华。

从人类战争的历史演进来看，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

^{*} 发表于《军事学术》2005年第12期。获全军首届政治理论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总参首届政治理论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战争—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进程，不仅表现为武器装备这一物质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还表现为军事认识这一观念形态的革命性进步；不仅是物质力量在军事领域不断得到更大释放的过程，也是对军事及战争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得以不断跃升的过程。每一次重大的军事变革，既是一场军事技术革命，随之形成新的战争形态；也是一场军事认识革命，必然催生出新的军事理论。譬如，冷兵器战争产生了以军事谋略为特征的兵学理论，热兵器战争产生了以线式和散兵为特征的战术理论，机械化战争产生了制空权、制海权和闪击战理论，信息化战争虽然初露端倪，但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已层出不穷。军事理论作为军事认识的产物和结晶，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伴随着军事变革实践和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创新发展。

2 当然，必须看到，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使得军事及战争现象的影响范围日趋扩大、作用空间日趋拓展、功能结构日趋复杂、运行方式日趋多样，这也决定了军事认识变革的趋向走势，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对军事理论创新有着不同的时代要求。信息化战争的军事认识变革更为深刻和广泛，突出表现为认知空间的多维化、认知系统的集成化、认知工具的智能化、认知效能的精确化、认知主体的知识化，这使得军事理论创新呈现出视域拓宽、节奏加快、形式多样、作用直接和价值提升的显著特征。同时，要看到，面对急速变化而又鲜活生动的军事变革实践，军事认识有着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常常会受到种种阻碍，尤其是以往战争形态的成功理论及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束缚。相对于克服技术性、功能性阻碍而言，冲破观念性阻碍对于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更为关键。思想认识上的“滞后”，比技术装备上的“落后”更为可怕。军事理论创新既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知、探索未知、设计未来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摆脱束缚、超越自我、突破前人的过程。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必须站在军事变革实践的前沿去把脉军事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路径，坚持在解放思想中打破思想认识上的条条框框，在与时俱进中确立起与军事变革实践相适应的新观念，把握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积极抢占打赢未来战争的制高点，使军事理论创新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导向标”和“加速器”。美军在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时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彻

底摆脱以往作战观念的束缚，军事理论创新不到位，结果既想打特种战争，又想打空中战争，导致“滚雷”行动持续多年没有成效。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在推进新军事变革中以军事理论创新为先导，相继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作战”等全新的作战理论，为达成既定的战争目标他们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采用了不同的作战方式。这充分表明，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必须以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为突破口。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军事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更是一场头脑的革命、观念的革命，不从机械化时代的思想观念和做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确立起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信息观、科技观、时空观、系统观、质量观、效能观等，在军事理论创新上就难免不陷入“新瓶装旧酒”的尴尬局面。

实践论视角——军事理论创新与军事实践创新的双重互动是信息化战争制胜的关键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理论创新是实践发展的先导和指南。军事变革实践呼唤着军事理论创新。引领实践方向，推动实践创新，是军事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旨和目的所在。

不能不看到，以往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连接的如此紧密。信息化战争中军事理论嫣然扮演了战争“设计师”的角色。“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这句兵家要训，已被更深刻地揭示为“有什么理论打什么仗”。战争实践成了军事理论创新的延伸，战场成了军事理论创新的“实验场”。美军海湾战争“空地一体”的非线式机动作战，科索沃战争“空中打击为主”的非接触作战，阿富汗战争“全频谱支援”的特种作战，伊拉克战争“直击要害”的快速决定性作战，一场战争推出了一种新的主导理论。下一场战争怎么打，采取什么作战样式，应当说正孕育在美军的理论研究所和作战实验室里。当今，军事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运行方式和价值地位，在新军事变革实践中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军事变革，实际上是个不停顿的军事理论创新和军事实践创新的过程；更进一步讲，是理论创新不断转化为实践创新，实践创新又不断为理论创新注入新活力的过程。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军事理论



的更新周期明显缩短，而创新成果向军事实践的转化进程大大加快。美军从1999年初依据“快速主宰”思想提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到实际运用于伊拉克战争，不过短短的4年时间；而20世纪初，杜黑的制空权理论从提出到运用于战争实践用了近30年时间，富勒的机械化作战理论从提出到真正应用于战场也历时20多年。现在，军事理论研究的重心，已由“回顾”转向“跟进”，由“反思”转向“前瞻”。军事理论创新的触角直接伸向军事实践的前沿，理论创新不再仅仅是已有实践的注释和解析，而是未来实践的引领和创造；不再是从已有实践中找出可遵循的范式和路径，而是致力于揭示实践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规律，着力谋求打赢“明天战争”的对策和方略。

应当说，未来战争首先是从“实验室”里打响的，战场的较量先期在“虚拟世界”的对抗中展开。信息时代通过网络、仿真、人工智能、图形生成等高新技术建构的“虚拟未来空间”，使原本模糊虚幻的未来被以仿真的形式显现出来，并能在“交互”作用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就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设计未来战争的知识实践平台，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无缝隙”对接，加速了理论创新向实践创新的转化进程，形成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螺旋式”互动。军事理论创新更应被理解作为一种实践模拟和知识实践，而军事实践创新更应被理解作为一种理论实验和价值检验。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战争是以军事理论创新为牵引的军事实践创新，而每一场战争实践又是从更高层次上推动军事理论创新的起点。正是在军事理论创新与军事实践创新的双重互动中，将演绎出信息化时代的一幕幕战争活剧。

我们正处在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紧要关头。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我军建设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必须以加快理论准备、理论转型为前提。通过理论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战法创新等各方面的实践创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重互动中，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新的超越，这是新世纪实现我军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方法论视角——军事理论创新离不开信息时代军事科技变革与军事思维变革的双重激活作用

理论创新总是在一定的方法论体系支撑下得以实现的。进而言之，方法论体系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逻辑起点，又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军事形态发生的深刻变革，既集中反映在军事科技变革上，也突出表现在军事思维变革上。军事科技变革提供的科学的方法手段，军事思维变革提供的新的思维方式，由此构成了信息时代的军事方法论体系，并在此双重激活作用下军事理论创新空前活跃、发展迅速。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军队的组织机构、决策程序、运行模式和活动方式等，置于了一个由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环境”。这一以科学技术应用为动因引发的军事变革，实质上是围绕着信息搜集、甄别、整合、控制和处理方法手段的变革展开的。也就是说，军事科技变革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方法手段的变革上。正是借助于“技术化环境”提供的模拟仿真、数学建模、概率分析、数理统计和系统集成等先进的方法手段，使军事理论创新摆脱了偏重于靠经验判断、靠定性分析、靠谋略思辨的传统模式，步入了科学化、技术化、系统化的发展轨道。一是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产生更依赖于先进的科技方法手段，虚拟战场环境、模拟实战演练、概念技术演示和行动计划实验等已成为支撑理论创新的重要技术平台；二是军事理论创新更加注重先进方法手段的综合运用，如“网络中心战”、“指挥控制战”等理论就是建立在综合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基础上的；三是许多军事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的是方法手段的创新，如“非线性作战”、“全频谱作战”等理论本身就是方法手段创新的结果；四是许多理论创新成果是以技术化的形态所表现的，如实验论证报告、行动程序设计、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日益增多。由此可见，在信息时代先进的方法手段的作用下，军事理论创新有了更科学的实现形式和更广阔的发展路径。

军事思维方式是一定军事形态的时代产物。它总是伴随着军事形



态的变革而变革，并以其具有的巨大威力影响着军事形态变革的进程。正在发生的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军事变革，也必然伴随着军事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当今军事思维方式更新的威力，尤为体现在对军事理论创新的激活作用上。从信息时代军事思维方式变革的趋势看，主要表现在：一是由实体思维转向信息思维，在思维指向上，从基于对物质实体的分析研究为重点，变为基于对信息资源的搜集、筛选和加工处理为重点，使信息不仅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且成为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基础和源泉。从近年来信息化战争理论的迅速发展看，信息思维是当今和未来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思维基点。二是由要素思维转向系统思维，从看重个体要素、单个功能，变为更关注体系结构、整体效能；从重视独自为战、单独发展，变为更注重系统整合、协调发展。并由此认识和把握信息化战争体系对抗的基本特征，改变传统的“要素打击式”战法，提出了“一体化作战”、“联合空间作战”等新的作战理论。三是由线性思维转向矩阵思维，打破直线式、平面式、封闭式的传统思维定势，形成网状式、立体式、开放式的思维方式，思维的触角更多的是伸向信息、系统、控制等，这样一些关系性的、功能性的、结构性的领域。“矩阵式管理”、“非线性作战”等新理论，正是在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引领下产生的。四是由单向思维转向多向思维，不是只从一个角度、一个途径、一个层面和一种可能性去认识思考问题，而是更注重从主客体以及相互关系所展开的多面性、多维性、多元性和多样性去认识把握问题。现在，“多维空间”、“全谱优势”、“全维作战”等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理论的核心概念。五是由静态思维转向动态思维，思维状态由侧重于静态的分析梳理变为注重于动态的跟踪展望，思考研究问题的重心不再是现状研究、解析研究、定性研究，而是前瞻研究、预测研究、趋势研究。美军近年来先后出台的《2020 联合构想》、《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空军建设构想、《21 世纪保卫美国》航空航天部队建设构想等，就是前瞻战略研究的重要成果。正是军事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使军事理论研究冲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从机械化军事形态的军事思维转变为信息化军事形态的军事思维，为军事理论创新的突破开辟了新的思维通道。

信息时代的军事理论创新，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与信息时代相适应

的方法论体系，用科学的方法和创新的思维去研究新问题、把握新规律、寻找新对策。这样，才能使军事理论创新跟上我们这个激变时代的节拍，不断提升理论突破的时速，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更有力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知识论视角——军事理论创新围绕着将信息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进而再转化为决策优势展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正在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标志着以知识生产和知识劳动为重要内容的知识实践已成为人类实践的主导形态。与此相适应，知识正在成为军队战斗力构成的核心要素，信息化战争的高级阶段实质是知识战争，信息化军队建设实质是锻造知识军事。

为此，能否占据“知识优势”，对于把握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主导权尤为重要。从农业时代的“体能军队”，到工业时代的“技能军队”，再到信息时代的“智能军队”，实质上反映了信息、知识在军队战斗力构成中不同的价值和作用。只有在信息时代，信息、知识才真正成为战斗力构成中起主导作用的独立要素。而从知识论的视角看，军事理论创新是一个将信息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的过程，理论创新成果的运用又是一个将知识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的过程；知识优势是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的不可或缺的中介和桥梁，当今科学决策更需要的是将知识的力量提升为理论的力量。

美军在1996年出台了《2010联合构想》，时隔短短4年，又推出了《2020联合构想》。值得关注的是，这其中反映了作战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前者强调谋求“信息优势”，以“信息优势”破除“战争迷雾”，实现“战场透明”；后者强调通过“知识优势”来赢得“决策优势”，认为消除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只靠“信息优势”不行，更主要是靠“知识优势”。这一新的作战理论十分强调：知识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可以保证更有效地运用作战力量，可以提高作战行动的速度和决定性程度。必须看到，虽然信息成为高技术武器装备发挥效能的关键，信息本身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相对于信息的获取和传输能力而言，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识别与选择能力更为重要。

显然，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识别与选择能力必须靠知识来完成，取决于军队乃至军人的知识化水平。

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未来信息化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较量。”^①正是因为知识比信息更接近于终极制胜力量，所以把信息优势变为知识优势，把信息力变成知识力，这是在未来战场上赢得“决策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应对战场上各种信息污染、信息欺骗和信息攻击的根本之举。历来知识都有着物化和教化的双重作用，物化作用是知识通过转化为技术手段和生产工具，变成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力量；教化作用则更突出体现在知识通过升华为价值理念，变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力量。在军事领域中，随着知识的价值和作用的提升，军事理论的价值和作用也大幅提升。通过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谋求知识优势和决策优势，抢占未来战争的战略“制高点”，已成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发展趋势。

其实，理论本身就是知识的重要表现形式。进一步讲，理论是对知识资源的系统整合和理性升华，是系统化、条理化和理性化的知识。知识创新包含着理论创新，但理论创新又是知识创新的核心部分，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创新。尤其是要在未来战场上赢得“决策优势”，更离不开先进、适用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作支撑。理论创新必须以知识准备为基础，知识准备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理论创新的视界就越宽、方向就越明、能力就越强。在信息时代，人类知识总量急剧膨胀，知识的时效性明显缩短，只有站在军事变革的潮头和时代发展的前沿，不断汲取新知识，着力深化知识武装，才能掌握军事理论创新的主动权。必须认识到，军事理论创新成果有其特殊性和相对性，不能盲目“套用”、简单“移植”，必须立足我军实际，把握特殊的战略需求，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武装头脑，努力提高我们军事理论的自主创新能力。

^①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29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技术论视角——推进军事理论创新要着力构建包括军事技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军事理论体系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社会也是技术社会。当代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机构体系是以信息、卫星、电信等一系列现代技术手段为基础构建的。在军事领域，现代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适应以科技进步推动军事发展、特别是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结合日益紧密的趋势，创新和发展军事技术理论，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构建当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

新军事变革以军事技术的创新发展为奠基，首先在技术层面展开，同时也必然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展开。这三个层面变革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决定着未来新军事变革的基本趋势和走向。正是在军事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才引起武器装备、体制编制、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变革。但新军事变革的发生和发展，其动因是战略需求。对于我们这支正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的军队而言，必须实现由技术牵引到顶层设计的转变，进而变被动式发展为主动式发展，变尾随式发展为跨越式发展。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推进军事技术理论的创新，根据战略需求明确军事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新重点、新任务，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军事理论的发展决定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但也反作用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因此，坚持理论先行，充分发挥理论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先导、引领作用，对于抢占先机避免盲目性，正确选择军事技术创新发展的途径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不看到，在军事理论研究上，我国一直受到重谋略而轻技术的传统影响，《中国兵书知要录》一书中介绍，我国史载兵书战策有 2300 余部，而关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论著仅占总数的 0.2%。在军事高技术已成为武器装备核心构成要素和重要战斗力的今天，我们必须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脱出来，一方面要把现代军事技术科学所揭示的原理、原则引入军事理论，不断为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注入新内容、开辟新领域、提供新手段；另一方面要把创新发展军事技术理论作为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为实现军事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努力构建起以基础理论为根基、以应用理论为主体、以技术理论为支撑的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体系。

当今军事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包括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制导技术、系统技术和软件技术等形成了一批高技术群,使得军事技术创新成为一项涉及面广、科学性强、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迫切要求军事技术理论的正确指导。要围绕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目标,不断创新军事技术理论,以理论创新牵引技术创新。一是准确把握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追踪军事技术发展的前沿,以信息化为基点加强军事技术发展战略的研究,着眼推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探索军事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明确发展的重点、步骤和战略举措。二是高度关注对军事变革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重点领域,明确未来高技术战争对武器装备的基本需求,正确把握武器装备的技术结构日益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加强对武器装备发展趋势的预测与预研,科学论证武器装备建设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使武器装备建设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相适应,与未来军事斗争的要求相适应,与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三是通过加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军队武器装备建设与发展路径的研究,吸收和借鉴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开拓军事技术创新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军事技术创新的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研究制定武器装备技术创新的相关法规制度,为提高军事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四是把握军事技术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趋势,加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信息论、军事系统论、作战指挥控制论、军事计算机网络理论等学科的建设发展,为推动军事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和科学根据。

信息时代的军事思维变革^{*}

军事思维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军事形态相联系，总是伴随着军事形态的变革而变革，并以其具有的巨大威力影响着军事形态变革的进程。正在发生的以信息化为本质和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必然带来军事思维领域的深刻变革。循着军事思维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入探究信息时代军事思维变革的特点规律，无疑对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正确把握先机、引领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信息时代军事思维呈现的新特征，标志着军事思维领域正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革

军事思维是人们在军事实践中的一种思维活动，有着作为一个特殊思维领域形成的一般特征，诸如预见性、超常性、灵活性、时效性、敏锐性等。同时，有什么样的军事实践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思维。军事思维发展变革的轨迹必然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在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之时，军事思维必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征和新态势。

思维主体的多元化。从军事实践的历史演进看，军事思维主体在基本形态上是一个由个体向群体、由封闭向开放、由一元向多元的发展进程。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一进程明显加快，“群体效应”、“多元

^{*} 发表于《中国军事科学》2007年第6期。



构成”、“开放格局”正成为军事思维主体的新形态。因为，进入信息时代，不仅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覆盖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使得军事思维的元素——军事信息资源被“无限量”扩展、“无遮蔽”传送、“无时差”共享；而且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系统把军事和整个社会更为紧密联系在一起，军事领域日益和社会的其他领域融为一体，使得军事与非军事的界限趋向模糊。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不再仅仅是军事体系、军事实力的对抗，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仅军事战略和战争决策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战略融为一体，成为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国家行为；而且军事和战争谋划、决策所需思维素材的来源更加广泛，成为社会机构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因此，信息时代的军事思维，不再是少数军事英才的“特权”，或是职业军人的“专利”，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决策机构，思维主体正演变成为一个多元化、社会化的开放格局。现在许多国家的军事“思想库”或“智囊团”，不仅聚集了军界的精英，还汇聚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在辅助决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不仅在决策咨询上，而且在战争准备和武装力量建设的谋划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美国类似于兰德公司这样的决策咨询机构有 2000 多家，可为军方提供大量诸如论证报告、规划设计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目前，在我国地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从事国际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方面研究的机构也有上百家，并取得了大量具有军事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当看到，思维主体的多元化，为军事思维领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之空前活跃，呈现出视阈拓宽、渠道广泛、形式多样、反映迅捷的新特点。

思维重心的信息化。思维重心在思维活动中起核心作用，规定着思维的基本指向。现在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信息和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信息不仅是人类大脑的产物，更是宇宙的一种物质性要素，与物质和能量一样真实的要素，而且应该成为信息时代所有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要素。思考信息时代的战争与作战，不但要把信息作为通过人和武器增强战斗力的“倍增器”，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战争物质能量。以往战争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源”，只有靠“信息流”的保障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作战效能，